

郭延礼

近代六十家诗选



87
I222.75
9
3

近代六十家诗选

郭 延 礼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B 317.332

近代六十家诗选

郭 延 礼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2.5印张 2插页 484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 10331·202 定价 4.60 元

前 言

中国近代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继承和发展，它的成就和地位是不可低估的。已故著名学者兼诗人汪辟疆先生在《近代诗人述评》中云：“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使无近代诗家成就卓卓如此，诗坛之寥寂可知。……清诗既以近代为极盛，则近代诗地位之重视可知。”^①钱仲联先生也说：“诗学之盛，极于晚清。”^②另一方面，近代诗的数量也相当可观。陈衍《近代诗钞》录咸丰以来诗人三七〇家，严伟、沈逢甘、万钧等人所编选的《近代诗选》，选道咸以来诗人五〇九家，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录道光以来四朝诗人两千余家，徐世昌辑《晚清移诗汇》，收清代诗人六千一百余家，属于近代诗人者如以三分之一计，也当在两千家以上。至于近代诗的总数虽无人作过专门统计，我想现存诗至少当以十万计。因为仅樊增祥一人，就有诗万首以上^③。尽管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诗钞、诗选、诗汇的选录时限，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近代”，但由这一粗略的统计，我们便可看出近代诗歌创作的繁荣情况。

①《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第29页。

②《近代诗评》，《学衡》第52期。

③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云樊增祥“遗诗三万篇”（第191页），疑不确；但樊氏一生写诗万首以上是可以肯定的。

—

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是异常迅速的，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诗歌。

一八四〇年，英国资本主义用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接着以割地赔款、丧失国家主权为内容的不平等条约相继而来，从此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也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序幕。

鸦片战争的炮火震惊了沉睡古老的中国，首先惊破了一些文人“饮酒酬唱”、“游园赋诗”的美梦，当他们醒来之后，战火已燃遍东南沿海一带，他们耳闻目睹外国侵略者烧杀淫掠的暴行、祖国河山的残遭蹂躏以及广大人民的痛苦和血泪，出于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他们拿起自己的笔写了一些反抗外国侵略的诗篇。这时期的诗人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首，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是一批进步的诗人，如张际亮、张维屏、陆嵩、朱琦、林昌彝、汤鹏、黄燮清、姚燮、蒋湘南、贝青乔。他们的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的时代风云。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诗人龚自珍(1792—1841)就在他的《漫感》、《己亥杂诗》中表现了他主张严禁鸦片、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他的《己亥杂诗》中有三首是写鸦片问题的，其中一首是为怀念身处禁烟前线的林则徐而作：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薨勋。

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这首诗情真语挚，深沉地表达了诗人对禁烟前途的关注与担忧；同时也表露了诗人以不能对好友所领导的禁烟运动有所帮助为憾。龚自珍的好友魏源(1794—1857)则通过自己的诗作《寰海十章》、《寰海后十首》、《秋兴十章》、《秋兴后十首》、《秦淮铎船引》等，更加深刻地描绘了这次战争中清王朝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的卖国行径。“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人”，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气势是何等的雄伟壮阔！

林则徐(1785—1850)，既是近代一位政治家、民族英雄，又是一位诗人。“上筹国计下民生”^①，是他一生居官处世的宗旨；而反映在文学上，治国安邦、忧国忧民，象一根红线贯穿在他的全部诗歌创作中。特别是鸦片战争中他遭投降派打击、遣戍伊犁时期的诗，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②“不信玉门成畏道，欲倾珠海洗边愁；临歧绝目仍南望，蜃气连云正结楼。”^③“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④诗人在遭受投降派的打击后，毫不考虑个人的荣辱、祸福、得失，而所念念于怀的仍是国家的命运、东南海疆的抗英斗争，诗中抒情主人公这种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恢阔磊落的胸襟，令人敬佩！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诗歌也有一定的成就，首先是起义军领袖讴歌革命的诗歌，象洪秀全的《述志诗》、《诛妖歌》、

①林则徐：《石梧移抚吴中七迭前韵寄奉》。

②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③林则徐：《同庄赠诗六章次余题萝月图韵……》。

④林则徐：《次韵答陈子茂德培》。

《吟剑诗》，洪仁玕的《二月下浣军次遂安城北吟于行府》，石达开的《白龙洞题壁诗》，或抒发革命的情怀，或宣传“吊民伐罪”的革命理想，或歌颂太平军战士的斗争精神，诗中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饱满的战斗激情，是太平天国革命战斗的艺术纪录。其次，这时期的诗歌创作，值得注意的是诗人金和、江湜等人的诗歌。尽管他们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诬称太平军为“贼”，在作品中也有诋毁革命、歪曲现实之处，但由于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有一定的认识，又亲眼目睹清军的腐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诗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界观的局限，在他们的作品中相当深刻地揭露了清军的腐败和残害人民的罪行，金和(1818—1885)的《兰陵女儿行》、《烈女行纪黄婉梨事》；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两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前者歌颂与强暴势力斗争的兰陵女子，体现了正义战胜邪恶的人民理想的光辉，而强暴势力的代表——诗中的这位将军，就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后者写在太平天国京都住了十二年之久的少女黄婉梨，身“清如水”，而在清军攻陷南京的次日，官兵不仅杀死了黄婉梨的全家，还把她掳走，逼着她走上自杀的道路。诗云：

朝朝盼官兵，十有二年久。官兵既收城，全家开笑口。叩门来一兵，状貌比贼丑。搜屋无一钱，拿掣刀在手。女前跪致词：“请以身代母。”兵曰“不杀汝，杀汝全家人，汝能飞去否？”……

这首诗异常深刻地暴露了这批官兵烧杀淫掠、残害人民的暴行；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严明的纪律，对当时反动腐朽的清军具有极大的揭露力量。这两首长诗，其叙事的曲折多致，词锋的犀利流转，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也是值得称道

的。他如《初五日纪事》、《半边眉》、《接难民》、《十匹绢》等，都是很好的讽刺诗，从不同侧面勾画了清王朝官吏和军队丑恶的脸谱。

另一位诗人江湜(1818—1866)，他出身清寒，多次乡试未中，后来别人援例代他捐了一个九品小官，在太平军攻克苏州后，父母、妹妹均为此自杀，这使他确实写过一些仇恨太平天国的诗作；但他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却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对人民残酷的剥削，以至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其《寓斋即事》、《舟中杂为五言》、《重作》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贝青乔(1810—1863)的《哀甬东》是写浙江宁波一带人民在广西蓬勃发展的太平军革命影响下爆发的一次反勒索、反捐税、反迫害的斗争。“狼烽一夕过江红，血染连村成战垒。耕男馥妇猛一省，髑髅饮冤死犹警。”反动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使农民逐渐觉悟：为了生存，只有起来反抗，这正是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示。

在这时期的诗坛上还有所谓宋诗派，亦称宋诗运动。它的首领是程恩泽、祁寯藻、曾国藩。他们以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为标榜，实际上他们也并非专学宋，而是学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唐宋诸名家。本来宋诗运动的发端，是作为专事摹仿汉魏六朝和盛唐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反对“诗必盛唐”的极端拟古主义诗风，具有别开蹊径的意义；但由于这派诗人多是一些高级官僚和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生活贫乏，思想空虚，又主张从故纸堆中找材料，所以宋诗运动的成就不大。它的代表性作家属于近代者有邓显鹤、曾国藩、张之洞、何绍基、郑珍、莫友芝、范当世，以及前面提到的江湜等。这一派诗人中，情况不尽相同，毫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宋诗派诗

人是不公正的。比如江湜就写了不少现实主义的优秀之作；而在这派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当推郑珍。郑珍(1806—1864)家境比较清苦，除短期做幕僚和学官外，一生困厄，因此他对现实社会和人民疾苦比较了解，他写了许多富有社会现实意义的诗篇，《酷暑黎柏容内兄斋中》、《江边老叟诗》、《吴军行》、《捕豺行》、《五岳游侣歌送陈焕岩归南海》、《者海铅厂三首》就是这方面的优秀篇章。诗人晚年还写了一些新乐府，象《抽厘哀》、《南乡哀》、《经死哀》、《移民哀》、《禹门哀》、《东家媪》、《西家儿》，更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就其揭露社会弊端和黑暗现实的深刻性来讲，完全可与白居易的新乐府诗相媲美。当然，《巢经巢诗钞》中也有对石达开率领太平军路过贵州表示敌意和诋毁贵州少数民族起义的作品，这些应当进行批判。他如莫友芝(1811—1871)、范当世(1854—1904)^①等人，也写过一些优秀的诗篇。有郑珍、江湜、范当世三人在，全盘否定宋诗派之不妥明矣。

(二)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时期的诗歌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本世纪初，是近代诗歌发展的第二阶段，我们称之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时期的诗歌。

一八七三年，太平天国革命军及其余部捻军被彻底镇压下去了，但各地反侵略的群众斗争却此起彼伏。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他们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法、中日战争的

^①范当世是学宋诗派的重要诗人，但依其生活、创作年代，我把它放在了第二卷。

失败，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日益加深。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一部分具有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宣传维新变法，拯救祖国危亡，最后并发展成一次带有爱国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与此相适应，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想利用诗歌为改良主义政治服务，为拯救祖国危亡服务。他们提出了扩大诗的题材，创造新的意境，并在语言上要求运用新名词和通俗易懂。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又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产生了“新派诗”。所谓“新派诗”，也并非专指那些满纸新名词而又令人难以索解的诗，象谭嗣同的“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①、夏曾佑的“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徙”^②之类的作品（但即使对这类作品我们也应视为他们力图打破诗界传统束缚而另辟新诗界的一种尝试，不可一笔抹煞）；而主要是指描写新题材，表现新思想，而又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作品。这之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是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蒋智由、夏曾佑、梁启超等。其成就最大的当推黄遵宪、康有为。

黄遵宪(1848—1905)早在一八六八年的《杂感》中，就批判了唯古是崇、一味摹仿的恶习，提出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进步主张，为后来的“诗界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一八九七年，他又明确提出了“新派诗”的概念^③。他写了许多反映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诗篇，象《悲平壤》、《东沟

①《金陵听说法》。

②转引自《饮冰室诗话》第六十节。

③《酬曾重伯编修》云：“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

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渡辽将军歌》、《台湾行》、《书愤》、《夜起》、《逐客篇》、《番客篇》，时人有“诗史”之称。他的《今别离》，以代表西方自然科学新成就的火车、轮船、电报、照相来写男女别情，确实令读者耳目一新，被人誉为“以旧格调运新理想”的“千古绝作”^①。他的诗虽不能完全实践自己的主张，但在诗歌反映现实和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方面，在打破旧格律的束缚方面，为“诗界革命”作了杰出的贡献。

康有为(1858—1927)，他不仅是近代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虽然没有人明确说他参加过“诗界革命”，但他也是属于新派诗人行列的。这并不奇怪。康有为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作为为改良主义政治服务的“诗界革命”，当然与他有着很大关系。康有为强调诗歌必须反映新的时代，必须为现实服务，所谓“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②，他又要求诗歌必须具有新意境。他在《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中云：“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他提出的“异境生”、“造新声”，都是为反映新的社会现实服务的，这两点也正是“诗界革命”的根本所在。康有为的诗写得很有气魄，所谓“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③。他的诗远法杜甫，近接龚自珍，继承了龚自珍积极浪漫主义传统而又有所发展，他的许多名篇如《秋登越王台》、《闻邓铁

①何藻翔：《岭南诗存》。

②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香鸿胪安南画界撤还却寄》、《过昌平城望居庸关》、《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写得境界高远，词气浑雄豪迈。汪国垣说：

“反虚入浑，积健为雄，惟南海足以当之矣！”^① 诚为的评。

康有为还写有不少海外诗，是他流亡异域之作，这些诗中尤多长篇巨制，象他的《泛挪威寻北冰海纵观山水维舟七日极海山之大观》、《登巴黎铁塔》、《耶路萨冷观犹太人哭所罗门城墙》、《锡兰乘孖摩拉舰往欧洲，新睹巨制，目为耸然》、

《考验太平洋东岸南北美洲皆吾种旧地》、《游德国波士淡旧京……感怀故国，泪下沾襟，乃作长歌》。这些诗或描写异国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或赞颂西方的自然科学新成就，或借历史、文化的回顾和英雄豪杰的向往，抒发他的爱国情思，多具新思想和新意境。他的诗，在近代诗歌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1865—1898)，也是近代一位著名的诗人。他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但他的“新派诗”成就并不高，梁启超说：“复生自烹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② 这种批评是正确的。谭氏的新诗代表了“诗界革命”初期的水平，其特点就是“颇喜捃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我以为谭诗的成就主要是他三十岁之前的诗作。他的作品多数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象他的名篇《潼关》、《出潼关渡河》、《崆峒》、《陇山》、《秦岭》诸作，大气磅礴，气象雄浑。请看他的《潼关》：

①《光宣诗坛点将录》。

②《饮冰室诗话》第六十节。

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

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此诗豪气纵横，曾为苏曼殊所赞赏，并为此诗作画。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诗人要求冲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奔放情怀。至于他的《狱中题壁》更为人传诵。诗人临难勿苟，决心为变法而献身的英雄形象，赢得了无数读者的赞佩与景仰。

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之巨子”的丘逢甲(1864—1912)，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甲午战争时期领导人民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大将军。他的作品，抒发了诗人对故土的怀念，表达了他收复台湾、报仇雪耻、统一祖国的坚定信念，洋溢着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其思想内容而言，也是属于新派诗。

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批评家，著有《饮冰室诗话》。他本人也写诗。他前期的诗，热情奔放，昂扬奋发，表现了一种积极进取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形式上，他力求打破旧传统的束缚，象他的《去国行》、《雷庵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志未酬》、《举国皆吾敌》、《爱国歌四章》，均是体现他诗歌理论的佳作。

梁启超曾推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世诗界三杰”，但后两人的成就均不能与黄氏相比。夏曾佑(1861—1924)的诗，有相当一部分运用一些新名词和外国宗教故实，成就不大，他的诗亦颇有意境深邃之作，但不多见。蒋智由(?—1929)的诗是新派诗，他的诗在近代有一定的影响，成绩也比夏氏大。象他的《卢骚》、《醒狮歌》、《奴才好》、《有感》，传诵很广，“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反映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民族民主思想的觉醒，他

的《奴才好》歌还曾被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在他的名著《革命军》中引用，影响尤大，他也称得起“诗界革命”时期一位代表性的诗人。

这时期诗坛上很活跃的还有“同光体”诗人。所谓“同光体”，它是由宋诗运动转化而来的产物。陈衍说：“丙戌（1886年）在都门，苏堪（郑孝胥）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堪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这里所谓不专宗盛唐，只是一种反面的提法，实际上“同光体”的宗旨以宗宋为主而溯源于韩杜。“同光体”的代表性作家有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衍、袁昶等人。对于这一派作家，当如对“宋诗派”一样，应有分析、有区别地对待，一概抹灭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比如陈三立（1852—1936），他系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曾在湖南帮助其父推行新政，赞同维新变法。他于诗主张“避熟避俗”，好用僻词拗句，流于艰涩；他后期的诗也缺乏现实内容，这是事实。但陈三立有些诗亦具家国兴亡之感，其中蕴寓着爱国之情，如《江行杂感》五首之四、《人日遣兴》、《短歌寄杨叔玖时杨为江西巡抚令入红十字会观日俄战局》等，至少这部分作品还是应当肯定的。此外，他的《赠黄公度》一诗，刊于《饮冰室诗话》，梁启超对其评价甚高（平心而论也难称佳作）。但由此可见他与“诗界革命”中新派诗人密切的关系。

沈曾植（1850—1922），他是清朝官僚，曾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等。他也是一位学者，于辽、金、元史地颇有研究，曾为王国维所推许^①。他的诗

^①见《观堂集林》卷十九《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虽一度被陈衍推为“同光体之魁杰”，然遍读《海日楼诗集》，实则看不出什么好来，他可以说是“同光体”中典型的“生涩奥衍”派，比起“力求生涩”的陈三立来，大有过之。

陈衍(1858—1938)，他是“同光体”的诗评家，选有《近代诗钞》二十四册，又撰有《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颇带有点权威性，但他的诗实在写得很平淡。

除了“同光体”诗人外，这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王闿运(1832—1916)。他写诗宗汉魏六朝，故人称汉魏六朝派。陈衍说他“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辨，不必其为湘绮之诗矣。”^①胡适干脆说王闿运的诗是“假古董”，并武断地说他的诗“还不能完全当得一个‘通’字”^②。今人因袭旧说，对他的诗完全持否定态度，则未免失之偏颇。诚然，他的诗集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诗是“杂凑摹仿”的，几乎没有“我”在，纯属拟古之作。但湘绮的诗并非全部如此。比如他的《发祁门杂诗》二十二首、《独行谣》三十章和《圆明园词》，都是有关时事和国家兴亡之作，特别是长诗《圆明园词》，文笔清丽，华实并茂，委婉讽谕，具见深意，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之一。此外，他还写有《形势感赋》、《长沙抢米风潮》、《闻秋瑾烈士迁葬西湖》诸篇，感叹国家危亡，哀悼革命先烈，关怀民生疾苦。这类篇什，均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把王闿运的诗说得一无是处，认为他的写诗，“说穿了，只是一种逃避现实、自我麻醉的方法而已。”^③六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近代诗选》，于近代这样一

①《石遗室诗话》。

②《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③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选注《近代诗选·前言》。

位大家的诗一首不选，似乎有些处置失当吧！

这时期还有一位李慈铭(1829—1894)。李氏是一位学者兼诗人，他学识渊博，其《越缦堂日记》颇为学术界重视。他写诗不名一派，不宗一体，在当时诗名很大，且自视甚高。他曾对其弟子樊增祥说：“今作者虽多，皆仅有其一体，倘杂试十题，鲜不缩手噤口者。若夫精深华妙，八面受敌而为大家，则吾与子不敢多让。”其实他的诗写得很平常，内容比较空泛，艺术上也缺乏创造性，名不副实。

(三)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歌

一九〇五年夏，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成立，在“更完全的意义上”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端。从同盟会成立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我们称这十五年的诗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歌。

同盟会中许多革命党人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著名的有黄兴、宋教仁、廖仲恺、于右任、秋瑾（后来有的还参加了“南社”）。他们自觉地以诗歌为武器，为推翻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呐喊、而歌唱，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黄兴的《吊刘道一烈士》、宋教仁的《哭铸三尽节黄岗》、廖仲恺的《诀别》、于右任的《杂感》，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在这些诗人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是秋瑾。

秋瑾(1877—1907)，她不仅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女革命家和女英雄，而且也是才华闪烁的女诗人。为了探索拯救祖国危亡的道路，她抛家弃子，远渡东瀛，回国后，即组织领导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她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

秋瑾的诗，是她英雄性格和光辉人格的艺术体现；是她对祖国一往深情、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以及她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生动而真实的写照。其中闪耀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辉。她的诗风格浑雄豪健，富有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秋瑾的诗作中，诗如其人，革命和诗不仅完全统一起来了，而且还得到完美的艺术体现。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在诗歌创作上最主要的一支队伍是“南社”诗人。

南社，一九〇七年筹备，正式成立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它是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拥有队伍数百人^①。柳亚子是其首领，诗作成绩亦最大；重要的诗人还有陈去病、高旭、宁调元、周实、马君武、黄节、诸宗元、徐自华、徐蕴华、张光厚、王德钟等。

揭露清王朝封建专制的残酷与黑暗，歌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南社诗人的共同主题。柳亚子（1887——1958）说：“它（南社）底宗旨是反抗满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抗北庭的标帜了。”^②因此，他们在诗中从各方面揭露封建专制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柳亚子的《放歌》、高旭（1877—1925）的《海上大风潮起作歌》均是其代表作。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许多南社诗人投身于武装起义，并为之大声歌唱：

^①据统计，武昌起义前夕，南社社员有229人；民国成立后，南社有社员400余人；1916年11月，增至800人；1923年总数为1182人。

^②《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